

山西尹村遗址发现三座“窑算式升焰窑”



2022年发掘区航拍



2022年发掘的“窑算式升焰窑”

遗址概况及工作回顾

尹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旭来街街道尹村西北约50米的云中河北岸台地上,是忻州地区重要的龙山至夏商时期遗址之一。尹村遗址于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97年5月至7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发掘,面积为200余平方米。1997年发掘证实尹村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仰韶晚期、龙山晚期、夏时期及早商时期文化,其中夏商时期遗存是遗址主体。尹村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共分为三期,其中Ⅰ~Ⅱ期为夏时期文化,Ⅲ期为早商文化。

202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忻府区文化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发掘,比较重要的发现有夏代人骨坑H13,人骨坑内暴露在外人骨有12具,其中9具人骨位于坑内西侧叠压放置,其中有三人骨为俯身葬式,其余均为侧身,头向各异,无规律。而北侧坑壁有两具人骨,均为侧身葬式。且一具面向南,一具面向北。东南角坑壁位置有一具单独放置的人骨。该人骨压于灰坑塌陷后的生土上。仰身屈肢,面朝上,下肢伸入坑南壁的窠洞内。并且坑内其中一具人骨有明显的捆绑痕迹,怀疑为被杀死后抛入。

2022年工作情况

尹村2022年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继续2021年尹村遗址调查,2022年的调查主要任务为尹村东侧河拱村周围,为区域考古调查完成补上最后一环;第二阶段是对尹村遗址2021年调查核心区进行重点勘探,确定发掘区域;第三阶段开始尹村遗址2022年发掘。

尹村遗址东侧河拱遗址调查 河拱遗址位于山西省忻州市旭来街河拱村北及西北台地,该遗址南临云中河,北倚后山,东近牧马北路,西接208国道。其中大西高铁与原太高速南北穿过遗址区。此次复查的遗址面积大约10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共设11个采集点,发现18个灰坑以及两段文化层和一处陶窑遗址。遗址的实际范围远超三普所公布的范围。

遗址内遗存保存良好,并且较为集中。遗存主要集中分布于河拱村西北部和北部。遗址区内多种植玉米、红薯等旱地农作物。该遗址遗物分布较集中,并且遗址两个区域有明显不同。遗址东北及东南部多为龙山~夏商时期陶器,而其中器类主要为有领鬲、细柄豆(豆盘中间突起)、甗腰(有隔)、鬲足、刻划的泥质黑皮陶、绳纹深腹盆残片。纹饰主要为中粗竖向绳纹,中偏细绳纹,未见篮纹。陶质中夹砂占90%以上,泥质很少。陶色以灰黑色为主,偶尔可见夹心,内黑外红褐的黑皮陶。而于遗址西北部区域发现较多尹韶时期陶片,该时期的遗迹主要有2022河拱遗址第二采集点、第三采集点、第四采集点、灰坑H8等,所采集遗物中陶片夹砂较多,泥质较少。灰色和灰褐色较多。器型可见敛口钵(仰韶中期)、罐底部腹片、瓮口沿、鸡冠状釜手(庙底沟二期)。纹饰主要有横篮纹、左斜向绳纹、浅磨光篮纹。时代应为仰韶中期至庙底沟二期。

尹村遗址发掘区的勘探 2022年5月开始对尹村遗址进行勘探,共分为三个地点。其中第一地点位于2021年尹村遗址发掘区偏西北部台地,勘探面积13000平方米,最后确定为2022年发掘区。第二地点为勘探第一地点时采集陶杯所在地,位于勘探第一地点的北部台地上,勘探面积约1200平方米。第三地点为2021年尹村遗址调查时设立的第21采集点,即石钺采集点,勘探面积约1000平方米,但勘探后并未发现灰土,该地点土层未有扰动。

勘探第一地点宏观上位于尹村遗址中心位置,由该点向北望可直视金山中轴线,并且位于距离云中河五公里以内的台地上,地理位置尤为优越。勘探地点南北长约100米,东西长约130米,面积约13000平方米。该地区地形堆积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勘探后发现灰土多集中于南部,并且多为2米以上深坑,灰土上为活土。南部探孔与北部探孔的深度差距较大,北部大多于0.3~0.5米左右见生土。整体埋藏较2021年勘探区更深。

在勘探第一地点时,于小路北侧采集到较完整的夏代麦粒绳纹方陶杯一件。因此怀疑勘探第一地点北侧有夏商时代遗存,于是以陶杯采集点为基准点勘探。该地点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40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该地点灰土分布较分散,并且灰土上堆积较厚。该地点的平均深度为0.9~1.0米。灰土较少,并且深度较浅,多为1.5~1.8米。并且陶杯采集点附近均为生土,推测可能为单个破坏严重的灰坑,因此放弃该地点为发掘区。

2022年勘探第三地点位于尹村遗址西北部高台,位于遗址的北部边缘,西面近邻断崖。由于采集到一件石钺,因此怀疑该地点为夏商时期的祭祀或

墓葬区。而以采集点为基准点勘探面积约1000平方米,但未发现灰土。但是该区域覆盖有0.4~0.6米的扰土层,因此推测石钺应为异地搬运。

2022年尹村遗址发掘收获 2022年尹村遗址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共布探方20个,探沟两条。共发掘灰坑26个,陶窑3座,瓮棺葬2座,以及墓葬1座。发掘区内地层堆积简单,大致分为四层:①层为耕土层;②层为明清时期扰土层;③层为夏商时期文化层,更倾向于商代晚期文化层,最晚可到殷墟一期或二期;④层为商代早期文化层。另外在其他遗迹中发现有大量的夏商时期遗物,如沟槽鬲足、浅细绳纹、麦粒状绳纹陶片、卷云纹陶片等;并且于部分灰坑中亦发现少量早期遗物如仰韶晚期彩陶片等。

2022年较为重要的发现主要有三座“窑算式升焰窑”样式的窑址、两座瓮棺葬以及一座小型人骨坑。

比较典型的“窑算式升焰窑”Y3位于发掘区东北部。方向324度。开口于③b层下,现仅残存窑室,火膛残部。现该窑室通体残高1.78米,残顶距地表2.12米,平面形状近似椭圆形,东西径2.06米,南北径1.70米,残高0.14至0.40米,窑壁之上向内弧收,原应为馒头状拱顶,现顶部已坍塌。窑床厚0.44米,出火口直径0.08至0.12米,平面呈“花瓣”放射状,上下垂直直通火膛。窑床现被烧烤成青灰色。窑门位于窑室东南端,现已残。窑门之下火膛门呈拱形顶,左上角局部塌落,高0.92米,底宽0.48米。上宽0.68至0.80米,壁面均为红烧土烧结面,其烧结面厚0.02米左右。火膛整体呈椭圆形,底径大于窑床直径,弧壁,平顶,平底。火膛前进步火口遭晚期坑H18破坏,仅残存长0.50米,宽0.62米。火膛东西最大径2.18米,南北最大径2.20米,高0.92米,烧结面厚0.02米左右。该窑室偏大,可烧制体量较大陶器,窑前工作面被H18底部全部破坏。

而小型人骨坑K2位于发掘区西北部。开口于②层下且打破③b层,坑口平而呈椭圆形,于坑内共清理出土人骨四具。该坑口底基本同大,坑壁较粗糙,基本呈南北向,其南北最大径2.50米,东西最大径1.80米,坑深0.72至0.76米,底部基本平坦。坑内置呈西南东北向人骨四具于坑底。头向西南,从西向东排列人骨存在相互叠压。存在俯身直肢与侧身直肢侧身屈肢葬式。西端人骨无颅骨,其余三具面向不一,有向东、向下、向西。未发现葬具、随葬品,性别为三男一女,属成年人,人骨保存一般。其年代推测为商代早期偏晚。

另外于发掘中发现有两座瓮棺葬,其中W1位于③层中,葬具较为简陋,为甗的上半部并由一件残半的鬲覆口。内有一具婴儿遗骸,头向东,四肢较为蜷缩,骨质保存较差。由于年代较远,婴儿身体大部进入甗中,只有头骨及少数肋骨位于甗中。而W2破坏严重,葬具为一件三足瓮,保存较差。内有一具婴儿遗骸,头向北,身型较W1更大,骨质保存较差。其中除婴儿颅骨位于瓮内,四肢及躯干均散落在外。

2022年尹村发掘价值和意义

2022年度尹村遗址发掘收获颇丰。虽然发掘面积只有500平方米,但是平均深度较深。发掘区内普遍有0.4~1米的扰土层,并且扰土层下仍有较厚的文化层,给发掘进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2022年度发掘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为“窑算式升焰窑”样式的Y3。而在山西地区类似的窑址多也见于二里头以外的晋南地区,如垣曲商城中发掘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窑算式升焰窑Y6,而在郑州商城发掘的洛达庙类型的窑算式升焰窑Y2也与尹村Y3多有相似。

2022年发掘地点位于2021年西北约200米处,发掘遗迹和遗物的时代集中在商代早期,包含二里头文化上下层,某些遗迹的使用时期可以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主要遗物为有领鬲、翻沿商式鬲、卷折深腹盆、敛口甗、有隔甗、短柄豆、假腹豆、盆形簋等,时代基本为商代早期。为研究忻定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更迭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翔实的材料。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忻府区文化和旅游局 执笔:王俊 郭银堂 王双)



1997年出土的部分遗物

山东唐代考古新发现 聊城傅大门唐代墓地

聊城傅大门墓地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原傅大门村址下。墓地南距聊城市区建设路约400米,东距二干渠约100米,北距电大路约180米。2022年3月至6月为配合聊城市东昌府区傅大门棚户区改造项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建设用地范围内勘探出的墓葬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共清理唐代墓葬35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蚌器、砖质墨书墓志等各类材质文物110余件套。

墓葬所在区域地层基本可分3层。①层为垫土层,厚度约1~1.7米,灰褐色沙土,含大量植物根系、现代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因该地块原为现代村落,现代沟坑较多,包含物杂乱。②层为淤沙淤土层,厚度4.8~5.2米,为唐代以后各时期的黄泛淤积,由浅黄褐沙土与红褐胶黏土叠压12小层,淤积痕迹明显,包含物稀少。③层为唐代文化层,厚度约0.8~1.2米,灰褐色沙土,含有红灰陶片、砖瓦残块及红烧土、草木灰颗粒等。所有墓葬均开口于该层。③层以下为淤土层,土质纯净,偶含料姜石等碎石块。通过在发掘区布东西、南北两条2米×140米探沟剖面可知,该区域唐代地貌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向140米内的高程落差为1.7米。墓葬大多位于发掘区的东南部与北部。

本次发掘墓葬时代皆为唐代,形制皆为小、中型土圜砖室墓,共清理35座。

小型墓根据形制可分三类

第一类:未带墓道舟形砖室墓,共12座(M6、M10、M11、M12、M13、M14、M15、M20、M23、M25、M35、M37)。墓圻平面呈长方形或弧边长方形,墓向南。墓室砖砌,底部平铺条砖,墓室南北两端窄,中段外弧,平面呈舟形。墓室壁条砖错缝平砌,顶部用条砖左右向内叠涩平砌,最顶缝隙用竖砖斜砌封顶。该类墓规模小,部分墓室内有棺痕,皆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南,人骨经鉴定多为未成年个体。随葬品多为白釉瓷碗、漆盒、塔式罐、铜钱,部分随葬墨书砖墓志。

第二类:带墓道舟形砖室墓,共10座(M2、M5、M7、M9、M17、M18、M22、M27、M28、M30)。墓圻平面呈弧边长方形,墓道较短,墓道底为斜坡式或台阶式,墓南向。墓道底部尽头为砖砌墓门,墓门下部条砖平砌,上部用条砖砌筑券拱,前有条砖斜砌或平砌封门砖。墓室中间外弧,北段尖窄,平面呈舟形。墓室砌筑结构与第一类小型墓大致相同。墓室内双人或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南。随葬品有白釉瓷碗、塔式罐、漆盘、铜钱,部分随葬墨书墓志。

第三类:带墓道马蹄形(椭圆形)砖室墓,共4座(M24、M26、M29、M34)。墓圻平面呈椭圆形,墓道细长,底部呈斜坡状,墓向南。墓道底部尽头为墓门,条砖平砌墓门,前有封门砖平铺斜砌至顶。墓室平面呈马蹄形(椭圆形),墓室底部用条砖平铺,顶部用条砖平铺叠涩渐收起顶。墓室内后半部有砖砌低矮棺床,双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存在迁葬现象。随葬器物有红陶双系罐、灰陶罐、白釉瓷碗、铜钱,部分随葬墨书墓志。

中型墓根据形制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圆形穹窿顶砖室墓,共7座(M1、M3、M4、M8、M16、M35、M37)。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南向,墓道平面呈长梯形,直壁,底部斜坡或台阶式至墓门底部。墓门两侧底部用条砖平砌,上部由条砖竖砌门券,前有条砖平铺斜砌封门。墓门后甬道较短,下用条砖平砌,顶部竖砌拱形券。墓圻、墓室平面皆呈圆形,墓室壁中下部条砖平砌,上部穹窿顶,砌法或用条砖斜砌内收或用条砖

江苏徐州地铁2号线物资市场站配套项目明代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徐州地铁2号线物资市场站配套项目明代遗址位于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物资市场站综合配套项目B地块内,即徐州市鼓楼区中山北路与黄河北路交叉口东北象限,东临中山北路,西临天阙广场建设工地,南临黄河北路,北临铜沛路。因工程施工中发现多处古代建筑遗迹,2022年8月至11月,徐州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对该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

遗址中揭露出的遗迹年代均为明代,包括房址4座,码头3处,石板路1座,院落1处,灶台1座以及砖砌高台建筑1座。出土遗物以陶瓷器为主,另发现有少量铁器、石制品和骨角制品,多为生活用器,并含少量兵器。瓷器以青花瓷器为大宗,陶器多为釉陶器。另外发现6件与船运相关的压舱石。遗址中部为略呈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流,根据地层堆积可看出河流因受黄河水患影响,河床不断抬高的过程。在河岸东西两侧发现连续成片的石砌建筑遗迹,部分石砌建筑有明显的、在不同时期多次修整、增筑延续使用的现象。

在开展考古工作前,项目地块内的建筑施工作业已进行至距地表下11米,考古发掘是在距现地表11米深处的墓坑中开展,因此无法准确获知发掘区地表至地表下11米的地层堆积情况,地层堆积自上至下分为12层。

根据地层关系和部分遗迹,遗址在时间上从早至晚初步分为四期。第一期遗迹包括码头MT3、石板路L1,房址F3、F4,以及多处石砌墙体。第二期遗迹包括码头MT1、MT2以及多处石砌墙体。第三期遗迹包括房址F1、F2,码头MT1、MT2,院落1处以及多处石砌墙体。其中一部分建筑是对第二期建筑的延续使用。第四期遗迹包括灶台、砖砌高台以及石砌建筑,大部分石砌建筑是对第三期建筑的延续使用。现对较典型遗迹分别简述。

MT3位于遗址最北端,其上表面距地表深14.45米,东西长12、南北宽7米,西侧临河处驳岸由石块错缝层层垒砌,驳岸自底至顶部高4米。MT3南壁东半部的底部埋设较密集木桩,应是起到增加稳定性作用。F3仅残存两柱础,其中北侧柱础上残存用板瓦包裹的木柱,推测木柱直径约22~23厘米。

MT1、MT2分别位于遗址东南角和东部偏南,根据遗迹不同高度部分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的差别,可确定MT1、MT2均经过至少2次续建,自第二期使用至第四期。第一次续建的石砌墙体部分,石块间的缝隙均填充石灰砂浆作为黏合剂。第二次续建所用的石块不规整,垒砌出的墙体较早期的简陋粗糙。MT2最早期建筑的顶部呈台阶状,北高南低,可能为早期码头设置的近水台阶。F1位于地块内东部偏南,房屋基址垒砌于⑤层上,残留房基距地表深12.25米。房屋平面呈长方形,坐南朝北,房屋外壁东西长5.6、南北宽4.7米。入户门位于房屋北侧中间位置。在入户位置揭露出一倒塌的隔扇,门槛内侧铺设青砖。F2位于地块内东部偏北。房屋垒砌于⑤层上,残留房基距地表深11.95米。房屋外壁南北残长6.1、东西宽6.1米,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西北角因施工破坏。F2室内地面由青砖对缝平铺。房屋东北角有两石柱础,东侧柱础长0.76、宽0.7米,西侧柱础边长0.66、宽0.6米。F2室外东侧发现6块与船运相关的压舱石,其中靠北侧2块用作室外建筑的基础。揭露出的第三期遗迹中面积最大的为一处院落遗迹,位于遗址东南,其中包括青砖铺设的路面、石阶(如意路踏)、砖铺路面为南北向,残长10、宽3.2米。青砖东西向成排



M8



M16出土器物组合



M32

叠涩内收。墓室内后部用条砖砌半圆形或“凹”字形棺床,外壁条砖平铺,内填土,上铺砖,部分棺床外壁雕壶门,墓室左右壁有灯架、直棖窗等砖仿木结构装饰。人骨皆为夫妻合葬,头向西,存在迁葬现象。随葬器物多置于棺床下或棺床西南角,器物有塔式罐、白釉瓷碗、漆盘、铜镜、铜钗、铜带具,部分随葬墨书墓志砖等。

第二类:带墓道侧室方形弧边砖室墓,共1座(M32)。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墓室和左右2侧室组成。墓南向,墓道平面呈长梯形,直壁,底部呈斜坡状至墓门底部。墓门两侧用条砖平砌,顶部用砖砌半圆券拱,前有条砖平铺斜砌封门砖。甬道较短,顶部砌拱形券。墓圻平面呈方形,墓室平面呈方形弧边,顶部早年坍塌,形制不详。在墓室东西壁中部向外各砌一平面呈舟形侧室。主墓室后部有“凹”字形棺床。墓室内因进水,人骨散乱,头向不详。左右耳室内,也葬有散乱人骨。后经清理,该墓共葬人骨4具。随葬器物皆破坏,可辨器型有红陶罐、白釉瓷碗、铁釜头等,另在封门砖中清理一方墨书墓志。

此次发掘共清理出纪年墨书墓志15块,最早为唐垂拱二年(686年),最晚为乾宁四年(897年),再结合墓葬开口地层和墓葬类型、出土随葬品类型来判断,基本能确定傅大门墓地所有墓葬年代也在此时间段内。

本次发掘的35座唐代墓葬,15座纪年明确,为鲁西乃至山东地区的唐墓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尺。且墓葬形制多样,时间跨度大,为研究鲁西地区唐代中小型砖室墓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次发掘对4座墓葬存在的封土进行了解剖,明确了墓室营建时地上与地下的位置关系。以M8为例,通过解剖可知,该墓室的营建方式是五分之一在地上,五分之四在地下。墓室修建后,先对地上部分用三合土灌抹缝缝,再堆覆封土,并进行简单夯打。通过解剖复原可知,M8建成后至洪水来临前的地面部分封土高度至少还存在1米左右。

本次发掘的纪年墓葬,最早为垂拱二年,最晚为乾宁四年,且各墓葬相互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可从侧面反映出唐代博州城北郊的地貌变化不大。结合之前考古信息(主要是2020年聊城绳张遗址材料),把博州城址在现徒骇河橡胶坝公园位置存在的时间从晚唐再向前推200余年。并通过出土墓志记载再为唐代博州补充1里、1场、1草市、3村、1河、1路,丰富了唐代博州城北郊的历史地理信息。

墓葬中出土遗物数量不太丰富,但唐代晚期中小型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基本一致——塔式罐、白瓷碗、漆盘。这为研究该地区晚唐时期丧葬礼俗提供了新材料。

该墓地出土墓志记载墓主年龄,对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的年龄鉴定起到了重要的纠正和校订作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 执笔:刘禄 刘文涛 于中胜 范浩)



MT1和MT2航拍



灶台

进行错缝平铺,且用立砖以南北向在路面中砌出两条分界线,将铺装的青砖路面分割为三部分。砖铺路面西侧紧挨着一排高出路面0.3米的南北向矮石墙。石阶发现两处,位于院落与矮石墙交界处,均设置3层,石阶最上层表面与矮石墙顶部高度相同。属遗址第四期的灶台,位于遗址东南,垒砌于④层上,灶台为并排双灶,砖砌,东西长1.4、南北宽0.8、高0.54米,灶台内壁抹泥。

明正统本《彭城志》载:“递运所在城北半里,洪武二年建,额设红船六十四只,船夫五百九十七名,防夫六十名。”递运所为明代设立的用于运输人员物资的官署机构。本次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遗迹遗物,包括码头、压舱石、铅船、船钉、用于麻袋封口的铁质针、兵器等,与船运表现出密切联系。遗址内建筑规模大,多处建筑的增筑延续现象表明使用时间长,说明当时这些建筑的重要性以及所在位置的稳定性。遗址位于明清徐州城址内,与地方志记载的明代递运所位置相符。综上,推测该遗址与明代徐州递运所有密切关系。

(徐州博物馆 执笔:谢威 吕健)